

MoDu Shanghai

Riben Zhishiren de “Jindai” Tiyan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刘建辉/著 甘慧杰/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魔都上海

——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



MoDu Shanghai

Riben Zhishiren de “Jindai” Tiyan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上海史研究译丛

刘建辉/著 甘慧杰/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魔都上海

——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刘建辉著;
甘慧杰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2
(上海史研究译丛)
ISBN 7—5325—3605—X

I. 魔... II. ①刘...②甘... III. 上海市—地方
史—史料—近代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5669 号

劉建輝
魔都上海
講談社 2000 年
本书据日本讲谈社 2000 年版译出

上海史研究译丛

魔 都 上 海

——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

刘建辉 著

甘慧杰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7\frac{4}{18}$ 插页 5 字数 133,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100

ISBN 7—5325—3605—X

K·543 定价: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64063949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点学科项目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张仲礼 陈 绛 魏斐德(美)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军	马学强	卢汉超(美)	叶文心(美)
叶凯蒂(德)	毕可思(英)	安克强(法)	张晓敏*
周 武	周育民	高纲博文(日)	梁元生(香港)
熊月之*	黎志刚(澳)		

有*者为执行编委

执行编辑: 张晓敏 吕 健

本书责任编辑: 谷 玉

美术编辑: 黄 琛

技术编辑: 富 强

上海这座城市,既饱经沧桑,给人以复杂的历史感,又生机勃勃,给人以常新的时代感。用得着一句老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上海史研究,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海外学者更是情有独钟。即使不算一百五十年前麦都思对上海历史的简单描述,也不算稍后麦克莱伦的《上海史话》、裘昔司的《历史上的上海》,单从 1921 年、1923 年寓沪英国学者兰宁、库寿龄共同推出的功力深厚的两大卷《上海史》算起,海外学者对上海史的研究已有 80 个年头了。尤其最近二十多年,海外上海史研究更明显呈现“四多”,即项目多、会议多、成果多、人才多。在美国,西部伯克利、洛杉矶、俄勒冈,东部康乃尔、哈佛,北部密西根,都各有学者在研究上海史。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我国的香港、台湾,也都有学者在从事上海史研究。日本有上海史研究会之设。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因研究上海史人多势众,在美国学术界曾有“上海帮”之谑称。

上海史已是海外汉学界公认的热门话题,堪称显学。

海外学者究竟发表过多少关于上海史的著作,难以确计。据不完全统计,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德、法、英、日等国关于上海史的博士论文已有不下三百篇,正式出版的上海史著作不下五十部。

上海史是内蕴极丰的富矿,开采眼光、冶炼技巧因人而异,其产品自然也多姿多彩。有的对社会史、文化史感兴趣,有的对政治史、经济史感兴趣;有的纵贯古今,有的横跨多门;有的以资料翔实著称,有的以议论充当见长。他们共同构成上海史园地的繁盛景观。

上海史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翻译海外上海史研究成果是上海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城市史、近代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学科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上海史研究译丛》遂应时推出。

本丛书所选各书,是我们接触到的优秀著作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书颇具价值,但或因已有中文译本,或因翻译版权联系未妥,未能列入。遗珠之憾,尚望鉴谅!

本丛书编委会成员除了上海的学者,还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香港的学者,他们都是上海史研究专家。在《译丛》组织出版的过程中,他们帮助推荐作品、联系版权、校订译文,付出了很多劳动。

本丛书具体翻译工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

张仲礼、陈绛、魏斐德(美)三位著名学者多年从事上海史研究,欣然担任《译丛》顾问,帮助规划全局、解决疑难问题,使丛书增色不少。编委会特此表示感谢。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上海歹徒

——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

[美] 魏斐德/著 芮传明/译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

[日] 小浜正子/著 葛涛/译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

熊月之/著 马学强 晏可佳/选编

移民企业家

——香港的上海工业家

黄绍伦/著 张秀莉/译 李培德/校

上海道台研究

——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

梁元生/著 陈同/译

魔都上海

——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

刘建辉/著 甘慧杰/译

上海妓女

——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

[法] 安克强/著 (即出)

家乡、城市和国家

——上海的区域网络和认同，1853—1937

[美] 顾德曼/著 (即出)

上海警察

[美] 魏斐德/著 (即出)

霓虹灯外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卢汉超/著 (即出)

人为的中国部族

——上海的苏北人，1850—1980

[美] 韩起澜/著 (即出)

目 录

序章 两个上海	1
第一章 武士们的上海	12
一、资本主义的“最前线”——志士们的“西洋”体验	12
二、高杉晋作等的冲击	18
第二章 东亚信息网络的诞生	23
一、交替的“信息先进国”	23
二、向东亚的“枢纽”迈进	28
第三章 日本的开国与上海	37
一、信息发源地·墨海书馆	37
二、汉译洋书带来的“西洋”	45
三、促使日本开国的两个“上海人”	61
第四章 被“浪漫”挑逗的明治人	68
一、“近代”产生的魔都——茶馆·妓馆·烟馆	68
二、摇摆不定的认同感——明治日本人的上海体验	80
第五章 沉溺于魔都的大正作家们	87
一、谷崎与芥川——旅游与大正作家	87
二、文化的越境者——从井上红梅到村松梢风	98
第六章 “摩登都市”与昭和	105
一、摩天楼和摩登小姐	105
二、消失的现代主义	108

尾声 从上海看日本.....	114
后记.....	121
译后记.....	124

序章

两个上海

拐骗的都市 那个男人被上海了——对于众多的读者而言，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恐怕全然摸不着头脑吧。其实，这句话是从英语那里过来的，意思是说，那个男人被拐骗到船上当了不等的水手。翻开词典，Shanghai 这一词条下，除了解释为中国的一个港口城市之外，在当作动词使用的时候，确实解释为，为了使某人充当水手，先将其灌醉，再拐带到船上，胁迫其就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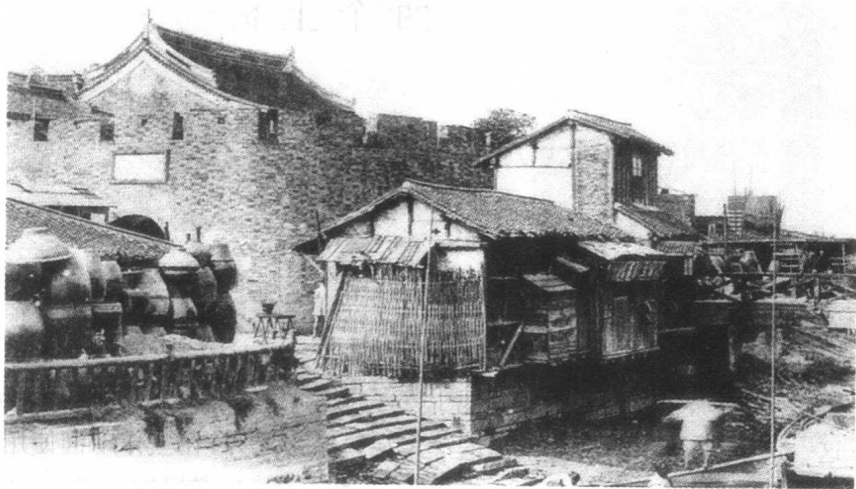
另外，这个用法在日语中也出现过。例如，在活跃于昭和初期的小说家谷让次的作品中，有一篇名为《被上海的男子》（1925 年）的短篇小说，它以神户港为背景，讲述了一起外国轮船制造的绑架事件的始末，简直就是对上述词典解释的具体描绘。

一个城市的名称被当作动词来使用，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也许，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事实更能说明曾经被冠以“魔都”之名的上海的“魔性”。而且，上海的这种“魔性”，比当时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世界级大都市中的任何一个更具激进的色彩，可以称得上是过激了一些。现在，人们把 20 世纪前半叶的某个时期的上海，形容为“冒险家的乐园”、“欢乐之都”、“东方的巴黎”，给它戴上各式各样梦幻般的绰号，称之为能够使所有人实现其梦想与欲望的地方，是一个“世界上最受人注目”^①的城市。

两个异质的空间 上海的这种凌驾于世界其他大城市的“魔性”，究竟源自何方？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归结为“辐辏的时间性”^②，例如，仅仅在 150 年的短时期内，上海便轻易地走完了西方的近代化历程。但是，在

考察时间性的同时,必须更多地考察地缘政治学的特殊性,亦即“辐辏”的空间性。

这是因为,今天我们所指的上海,实际上被分割成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空间,一个是以旧上海县城为中心的拥有 700 年历史的传统空间,另一个则是以所谓的“租界”为中心的仅有 150 年历史的近代空间。



旧上海县城城墙

而且,直到 1912 年旧县城的城墙被拆除之前,这两者之间有着非常明确的“边界线”,分别由上海道和工部局这两个彻底不同的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在此意义上,上海的近代,可以说是拥有举世无双的“江南”这一宏大的传统文化背景的前者,与近似于漫无边际的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后者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可以认为,这两个背反的异质空间的相互侵犯乃至相互渗透,结果酿成了上海这种“魔性”的过激化。

具体来说,比如,在“租界”这个近代化的空间内,涌入了大量的茶馆和妓楼等传统的生活娱乐设施,于是,“租界”的资本主义均一性经常面临着被破坏的危机。另一方面,在“县城”这个以纵横交错的水路为运输网络的传统空间内,出现了许多条从“租界”延伸出来的被视作“越界筑路”的干线道路,它们不断地蹂躏着往常“水乡”的秩序。

另外,正是这两个空间无休止的“越界”,使上海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杂糅”的城市空间,同时,这也是上海具有凌驾于世界其他大城市的“魔性”的最大原因^③。

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城市 后面将要提到,由于上海具有这种强韧的“杂糅”性格,它不光影响到中国内部,也给东亚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上海作为该地区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圣地“麦加”,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提供各种各样有关“近代”的信息。而且,由于上述的原因,这种“近代”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世界性大都市的样态,在这里,不仅完全不存在具有向心力的民族主义,甚至对于所谓的以想象力的共同体为前提的“国民国家”包藏着破坏作用。

在此意义上,虽然上海“疾驰”了近代化历程,却没有陷入特定的民族主义的陷阱,上海的这种存在方式在世界上极为罕见。在迎来 21 世纪的今天,更确切地说,正是在这 21 世纪全球化的时代,上海过去的各种包含正负两面的历史经验,更有必要将其当作珍贵的记忆予以重新审视。这也是必须把上海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的原因。

为对付倭寇而修筑的城墙 本书基于上述的理由,以验证具有多种多样面貌的上海,尤其是有关日本人对于上海的各种“记忆”为目的。为了使今后的阐述更加明确,也许是画蛇添足吧,先简单地概说一下上海的历史与地理,以及上海对于各个时代日本人的意义。

如前所述,今天我们所说的上海,实际上包含着两个不同历史的“上海”。一个是以拥有 700 年以上历史的旧县城为中心的“上海”,另一个是 150 年前由欧美列强忽然打造的、以所谓的“租界”为中心的“上海”。两者之间的“边界”的变迁,历尽了曲折。直至 1945 年 8 月日军占领结束之前,还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行政机构管理着这两个空间。

上海简称“沪”,这来源于上海的古称“沪渎”。沪是一种用竹子制作的形状如同栅栏的渔具,“渎”是指注入大海的河口。把“沪”排列起来在河口捕鱼,是谓沪渎。可见,上海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渔村。

位于现在上海西郊的龙华寺,相传建造于遥远的三国时代,在这附近的龙华塔,据说是当时东吴的孙权施舍建造的,由此可知,这个“渔村”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不过,在上海首次设置行政机构,是在时代较晚的宋朝。南宋咸淳三年(1267),上海设置了“市舶司”的分司,管理货物检查、关税征收等事务,由此,上海逐渐成了上海镇。到了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在上海镇设置了市舶司,15 年后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终于升格为当时的最小独立行政单位上海县。当时,上海约有七万二千五百户人家(明正德《松江府志》)。

升格为县的上海,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其他县城理应拥有的城墙。这有几个原因,主要是因为该地区“素无草动之虞”(明弘治《上海志》),很少被战乱波及。然而,进入明朝中叶之后,长时期的和平突然被破坏了,倭寇袭来了。

根据《明史》等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从四月到六月,上海前后被倭寇侵袭多达五次,不仅许多居民惨遭杀戮,而且半个县城化作了焦土。为了防备倭寇的再犯,从该年九月开始,官府快速地修建环绕上海的城墙,仅用两个月时间,建成了周长九里(一里约600公尺强)、高二十四尺、拥有六个城门的城墙。如前所述,该城墙直到1912年才被拆除,因此,它守护着上海长达360年。

这个被新城墙包围的城市空间,给以后上海文化的形成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有些牵强,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上海”简直是由倭寇制造的。

朝着大海的门口迈进 上海在建成城墙的时候,已经充分发展成一个地方商业城市。表现为:一、这个时期的上海集中了众多的棉纺织业者,成了全国性的棉纺产品市场的中心。二、由于内陆水路运输业的急速成长,其贸易额达到每年数百万两白银^④。这时期上海的繁荣,虽然因清军侵略带来的战乱而呈倒退的趋势,但其“东南之壮县”的地位,自明朝中叶以后一直保持了一百多年时间。

给上海这个地方城市带来更为决定性飞跃的契机,是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出台的展海令。康熙二十二年,长期以台湾为据点与清朝对抗的郑成功的后裔向清朝投降,海上的抵抗势力自此完全被消除,清政府于翌年立即颁布了废除以往海禁的展海令。康熙二十四年,在上海设置了管理内外贸易的江海关,迅猛地推行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

江海关的设置,使上海这一地方城市的地位摇身一变。因为在当时,除了江海关之外,在中国沿海地区设置海关的其他城市只有三个,即:粤海关的广州、闽海关的厦门、浙海关的宁波。加入这几个城市的行列,意味着上海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内外贸易中心之一。

江海关设立后,在对内贸易中,由沙船带动的海运业再度迅速发展,在对外贸易中,早在江海关诞生的那一年,已经有十三艘贸易船被派遣到了日本。从此,上海开始向世人展示其作为东南沿海的门户这一姿态。

后面将要提到,当时日本把从上海航行到长崎的沙船称作南京船,并且把南京船与从乍浦出港的宁波船并称为口船。由包括口船在内的沙船所带动起来的贸易活动,不仅使上海逐步变为东亚的重要港口,同时也给该地区

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另外,明朝末年,县城内只有十条马路,到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六十条以上。道路的两侧,各式各样的商店鳞次栉比,仅钱庄(旧金融机构)就有几十家。这一时期,上海的对日贸易极为繁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对上海的繁荣所作的贡献。

租界的诞生 1845年,在这个拥有五百多年历史的“上海”的北郊,诞生了另一个“上海”(租界)。那一年,正值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根据南京条约,上海被迫开埠后的第三年。同年十一月,当时的上海道台(地方长官)宫慕久与首任英国领事巴富尔经过多次协商后,颁布了《土地章程》(第一次),规定清政府将沿黄浦江周围约0.5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为租界,作为英国商人的居留地。

当然,在县城以外的地方开辟居留地,本身就是英国方面的要求。

但是,从《土地章程》所规定的“华洋分居”等条文可以看出,这实质上是中国方面想要限制外国人活动范围的一种“隔离政策”。英租界设立后,1848年和1849年,美租界和法租界相继设立在英租界的北边界吴淞江对岸的虹口一带,以及南边界洋泾浜的对岸。这三个先后设立的租界,成了上海“近代城市”的原型。

租界虽然拥有一定自治权,但在“华洋分居”的原则下,根本上还是处于中国方面的管辖之下。然而,租界在设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很快地变换了它的性质。原因之一是,1853年9月,爆发了秘密结社小刀会的武装起义,由于农民军占领上海县城达一年半之久,因此产生了大量的难民,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逃到毗邻的三个租界之中。

由于这个突发的事件,原来“华洋分居”的原则彻底崩溃了。此后,中国方面和租界方面都只能接受所谓“华洋杂居”的现实。1854年7月,当时的英国领事阿礼国以为了应付新的局面为由,与美、法领事进行协商,对中国方面采取先斩后奏的形式,单方面修改了原来的《土地章程》,公布了《第二次土地章程》。

在《第二次土地章程》之中,包含了确定1848年协议的英租界的新边界、默许中国人在租界内居住、设置“巡捕”(警察)等内容。但是,最重要的项目,莫过于由三国领事召集相当于市议会的“租主”(租地人)会议、设置工部局作为执行机关这两项。特别是工部局,几乎被赋予了“市政府”的机能。工部局成立之后,租界几乎完全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开始了“自治”的进程。

完整的行政系统的建立 实现了“自治”的租界,在开始的时候,以被正式承认新边界的英租界为中心,在地理上英租界依旧与其他两个租界相互分离,但在行政上,由新设的工部局统一管理三个租界。而且,这个体制历经 1850 年代,大约维持了近十年时间。然而,以 1862 年太平天国进攻上海为契机,租界迎来了更大的变革。

为了防备太平天国的多次进攻、加强租界整体的防卫,大约在该年的年初,英、美租界开始谋求合并。在此之后,中美划定了原本模糊的美租界边界。1863 年 9 月,英、美租界在工部局的名义下正式合并,改名为外国租界(Foreign Settlement)。

与英美租界合并差不多同时,法租界方面已经对从一开始就令其极为不满的英国主导的租界运作失去了信心,于 1862 年 5 月,在英、美租界正式合并之前抢先一步,单方面宣告从统一的行政脱离出来,设立独立的行政机关——公董局。

当然,合并后的外国租界进一步扩大其管辖地区,并大大增强了行政能力。不过,虽然这种“自治”的现实有所进展,但另一方面,在原先支撑“自治”的《土地章程》中,作为其根据的记述是以极为模糊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因此,事实上,在以后的行政运作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障碍。

于是,鉴于太平天国之乱造成更多的难民频繁涌入租界这一现实,租界当局于 1869 年再次单方面修改了章程,公布了《第三次土地章程》。

这个新的《土地章程》,首先,将原来的租地人会议扩大为纳税外人会议,赋予其审议租界预算、选举工部局董事会(市参事会)等权限,使其完全拥有市议会的机能。

其次,进一步加强工部局原先的权限,将各种权限分担给各委员会,赋予工部局作为市政府的所有机能。例如,在工部局之下,设置警务处、火政处(消防署)、卫生处、教育处、财务处等与市政有关的机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

向独立国迈进 在这个《第三次土地章程》公布之前,工部局方面于同年 4 月颁布了关于居住于租界的中国人的审判权的司法规定。根据这个名为《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的规定,关于居住于租界的中国人的审判,由上海道台派遣的“同知”(审判官)在设置于租界的“会审公廨”内进行。但是,如果当事人的一方是外国人或外国人雇佣的中国人,则必须与领事或领事认定的陪审员一起进行审议,而且,如果被告不服判决,则可向上海道台和领

事官双方进行上诉。

这样,两个新《章程》颁布后,所谓的“外国租界”,只有在司法权上残留了一些模糊的味道,但在立法和行政领域内,可以说以完整的形态建立了一个“独立国”。而且,这个“独立国”体制,在其后的 19 世纪末,随着“领土”的进一步扩大,其名称也相应地从“外国租界”变为“公共租界”,大约一直存续到 1932 年日军发动了“八一三”事变为止。

另外,1862 年拒绝加入“外国租界”、设立了独立行政机关公董局的法租界,它的公董局不仅具有与工部局大致相同的机能,而且颁布了与英、美租界的《第三次土地章程》的内容非常相近的《公董局组织章程》(1866 年),还设置了与“会审公廨”同样的审判机构。在此意义上,虽然法租界与“外国租界”在实际运作上有所不同,但可以认为,法租界与“外国租界”一样,也建立了一个“独立国”。这个“独立国”在 19 世纪末两度扩大了其“领土”,由于在地理上更接近于县城,所以,可以说,它以不同于“公共租界”的形态,对“近代上海”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马赛克城市 这样,仅就“租界”而言,如果考察其内容,就会发现,那里至少存在着三个不同的“空间”。不用说拥有独立行政机关的法租界,在行政上合并的英租界和美租界之间,也因“住民”性格的不同,上演了很不相同的景观。在这三个不同的“空间”上,再加上原来的县城及其背后的传统水乡,上海形成了一个世所罕见的极为不合常规的城市空间,简直称得上是一个马赛克城市。

下面,就有关本书的舞台——上海这个马赛克城市的地理,在涉及 20 世纪初各空间的特色的同时,作一简略介绍。

首先是公共租界的中央区和西区,也就是旧英租界,它可以说是上述四个空间的中心部分。如前所述,该地区是作为外国人居留地的租界设立之后的最初区域,它的范围是:南北夹在苏州河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两条水路之间,东临外滩,西至静安寺一带的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

在这个空间内,被称作上海的“大门”的沿黄浦江的外滩,以及与外滩垂直平行的六条马路(北京路、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构成了该区域的基本轮廓。相当于“内院”的跑马场,作为上海最大的“休息”场所,也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把各国领事馆、银行、洋行林立的外滩比作政治乃至资本的空间,那么,以百货店为首的各色各样的商店鳞次栉比的南京路,则显然是一个商